

尚书

现代版

◆ 王宝琳

著

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神话？

——对《尚书》一种可能的诗意解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尚 书 现代版

◆ 王宝琳 著

子张问夫子：“十代之后的事情您能知道吗？”

孔子回答说：“殷代的人文制度是从夏代来的，周代是从殷代来的。这些制度虽说有的地方减少了，有的地方增加了，却不是不可以知道的。三代变迁既已了然，那么即使是百代之后的事情，又有什么难以想见的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现代版/王宝琳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
(现代版系列)

ISBN 7—5325—3459—6

I. 尚... II. 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商周时代②尚书—译文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142 号

责任编辑 黄益元

尚书现代版

王宝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5 字数 321,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325—3459—6

K·485 定价:2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看唐虞三代经营 世宇之迹

——代序

自 从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帮助下，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价值抉择以来，虽说其间也有魏晋士人对儒教的蔑视与反叛，佛、老文化在唐代同儒教的争雄，明、清“幽人”对孔孟的诋毁与进攻，二十世纪初叶一班留洋回来的超人发出“打倒孔家店”的怒吼——不管是何等偏激的异端，无论是怎样激进的新潮，到头来都没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文化在国人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都没能改变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即使是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儒

学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格局之中,也并没有变成“弱势文化”与“边缘的声音”。顺从也好,反叛也好,视若罔闻退避三舍,以至羞羞答答麻木不仁也罢,儒文化依然还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观念。舍此铁的事实,便不足以言中国的国情;舍此铁的事实,便不足以论东方文明的特征。

儒文化的信息库在哪里?什么是儒学话语的文本基础?——经典!第一是经典,第二是经典,第三还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典!

——《诗》、《书》、《易》、《礼》、《春秋》,这是汉代立在学官的五部经典。

——《诗》、《书》、《易》,外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这是通行于唐文宗之前的九部经典。在九部经典之外再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是通行于唐文宗之后的十二部经典;

——《周易》、《尚书》、《诗经》、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是由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手定,经最高统治者首肯,乃为儒学之精髓,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十三部经典。

“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于山岳”,从“五经”到“十三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开始《诗》第一,《书》第二,《易》第三;最后《易》第一,《书》第二,《诗》第三。——时代精神的转变虽然十分缓慢,但却非常彻底,《诗》的地位下降了,《易》的地位上升了,可是从秦、汉直到明、清,呈现为历史外观的《尚书》,其在儒家经典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发生什么变动。诗歌将它原有的辉煌让给了哲学,尽管阿波罗(太阳神)精神压倒了月神情节,可是充满敏感的历史观照却一直被解读为“诗”与“玄”的杠杆。时处民族精神向世界精神艰难前行的今天,人们对现实的认同

与建构,还是要看他对当下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作出怎样的历史观瞻!

一、“书”与“尚书”

说中国的历史如何悠久,说中国的古代文明多么灿烂,说来谈去,恐怕还是要归结到其源远流长的文字。不用说,书的出现当以文字的相对成熟为前提。而文字之初创,古人一直认为是受到天地万物的启发。文字是人类对自然万象之特征的模写与抽象。书记文字的发生学本质,《周易·系辞上》说得最为清爽:“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淮南子》云:“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论衡》云:“仓颉四目,为黄帝史。”《拾遗记》云:“轩辕始造书契,服冕垂衣”。这些说法虽然一时还不易拿出实物来印证,却与我们的逻辑直觉相去不远。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就已开始创造并应用自己的文字了^①。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时的商代开始,我们现在管它叫做“书”的东西,便以不断加大的力度和速度去日积月累了。《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文解字》云:“著于竹帛谓之书。”《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出于治国安民的需要,商、周两代的统治者将他们的谈话、政令刻写在竹、木片上,以便于宣传和保存。所谓“简册”或“方策”,也就是这样一些记载着政令文字的竹、木片,即中国古代流通最早的“书”。

现在看来,《尚书》就是这样一部官方文件的汇编。它之所以希奇,就在其天字第一号的原始、古老。从起源上看,这部光

辉的史册本是唐(尧)、虞(舜)、夏、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文献档卷,其中出自史官之手的实录部分最为珍贵。这类文献档卷最初究竟有多少篇,于今已经不可能给出准确的考定。汉朝的方士说本来总共有三千多篇。这三千多篇古册落到孔子手里,被他“断远取近”,以“可以为世法者”为原则,进行筛选,最后锐减到一百零二篇。方士的这一说法介乎事实与传闻之间,纵然材料不足凭,观念亦未必空穴来风。考周初天下诸侯多达一千二百国,东周以后大鱼吞小鱼,至春秋之时,列国数目在一百三到一百八之间,即使一国一篇,再加上往代所留及周王室所存,《尚书》的篇目达乎数百,必不成问题。又诸侯激烈兼并,国家一旦被人消灭,文档也就随之不保。最后硕果仅存,《尚书》遂为百篇,也是势所必然。

《尚书》沦落为百篇,于自然淘汰之外,又加之以人为的整编。司马迁《孔子世家》、《三代世表》都说孔子首先整理、编次《尚书》,并且为各篇之成因作解释。到了《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依然还是世间对此事的长期流传:“《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自宋儒以后,思想界由信古而疑古,由疑古而走向去伪。可是由于“去伪存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尽管怀疑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然而等到这第一步跨出去以后,第二步究竟落脚在何处,却又迟迟看不清楚。——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删《诗》、作《春秋》、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那会儿,不管完成没完成,孔圣人对《尚书》的整编总不能无动于衷。而百篇《尚书》的最后定型,不能不在秦人焚书之前结束。

至若《尚书》之名义,诸家都因“尚”“上”二字相通,而云“尚”为“上”。只是由于对这个弹性很大的“上”字的解释不尽相同,

才对这部经典的价值估价,发生了本可以彼此互补的偏差:

《尚书璇玑铃》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者,如也,如天行也。”不明就里的人一看,说《尚书》是“天书”,就瞪大了眼,不是摇头叹息,大骂吹牛,就是憋足了劲要来批判。其实大可不必。夫道之大源出于天,“天”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其所指称,不过是自然现象与自然规律。“书”者,“如也”,求自然之真如而写之以客观自然之道,并以此道为治国理民之根本方策,可谓经世之极致,变换今古而不可颠覆。若必欲口诛笔伐,那就有点堂吉诃德的样子了。看《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制定历法节令;《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理顺天下滔滔之水,重建九州,再树农艺;《洪范》经天纬地,以“五行”为基石,进而言“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治用三德”;《召诰》、《洛诰》相地卜水,周、召二公营洛于天下之中……所有这些都一再表明了《尚书》以顺天应人为旨归,由朦胧而清晰,力求将正在萌动中的科学精神与由来已久的人文理念融会起来的历史进程。

《春秋说题辞》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论衡·正说篇》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下所书。”《尚书》的精华最初出自历代史官之手,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光辉的史册,它对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影响,对汉、唐各代历史文化的滋润,没有任何一部史册能够与之匹敌。全书以《尧典》开篇,以《秦誓》为殿军,上起唐、虞,下迄春秋前期,中间是夏、商、周三代,所跨一千六百年(约前 2200—前 624)之时空,恰恰是中华民族处在大灾变、大复兴,大冲撞与大融合,文明创造之活力最为旺盛,民族精神正在孕育、诞生与成形之关键时期。这里没有从《红楼梦》到现代电

视连续剧里满目的卿卿我我与鸡毛蒜皮，不论是帝王的独白，还是君臣之间的对话，全是经营天下的鸿篇巨制，所言治国平天下之策，皆可警诫当时，垂范后世。

——《尚书》是天书，也是上世帝王经营世宇留下的遗书。所以汉代学者郑玄反观秦、汉以来经学的发展，盛赞《尚书》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书。他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由汉而唐，从天子到布衣，《尚书》一直受尊崇。常常是皇帝与儒生聚在一起研究、讲诵。甚至要由皇帝下诏，齐集天下的名儒，召开以《尚书》为重头戏的《五经》讲用会^②，看看究竟谁讲经为天下第一。东汉十四帝，在位不足一年的共五帝，其余九帝，除桓、献二帝的本纪未见有习《尚书》的记载以外，其他七位帝王全都是研习《尚书》的。《尚书》独领风骚，几乎成了汉朝皇帝唯一的必修学科。而“上有好焉者下必甚”，《后汉书·桓荣传》记载：“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两汉之间，习《尚书》而官至三公九卿者，接二连三，举不胜举。东汉传《古文尚书》的大师，往往门徒盈百，最多的竟达万人。

二、“今文尚书”的形成

大约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是后王法先王。淳于越之谏始皇也，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既然《尚书》乃是唐、虞及夏、商、周三代帝王经营世宇留下的遗迹，那么它对后来的统治者维持、加强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当然会有不可替代的参照价值。恰恰是因为它能够直接满足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这种急需，所以《尚书》之为学，才能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在秦、

汉之际一片焦土上迅速传播并发展起来。

据《史记·儒林列传》曝光：“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继秦之后，项羽雪上加霜，又在咸阳放了一把三月不熄的大火。千余年积累起来的文化典籍，不管是留存在民间的，还是由政府收藏的，几乎全被无物不焚的火舌吞噬了。等到中国历史上那位游荡市民出身的刘邦做了皇帝，手里除了萧何捷足先登捞到的那点户籍图册之外，凡有助于治化天下的典籍，几乎就是一贫如洗。天下这么难治，既不能老是抱着黄老之术不放，也不可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君王这才体察到了从事文化建设的重要。于是也就引出了汉文帝“欲求能治《尚书》者”的故事。

这故事的发展是戏剧，也是小说，线索很快又伸展到了孔子和他的故乡。

原来这齐、鲁故地，一个是牧野决战胜利后，周武王分封姜太公的地方；另一个是武王分封姬旦，以藩屏周，用来震慑东方徐、淮的战场。自从这海岱之间出了一位首创私人办学的文化泰斗，人杰地灵就更加非同寻常：不管你天下如何乱嚷嚷，人家山东的地面上照样有成群成群的儒士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水涨船高之下，便有一位姓伏，名胜，尊为“生”（先生）的济南人，二世时是秦朝的《尚书》博士。伏博士家藏宝典，道冠天下。楚、汉征战那几年，他不声不响把近百篇命根子藏在了老家的墙壁里。兵荒马乱之后，他回到故里，发现密藏在墙壁里的百篇《尚书》已经亡故“数十”，只剩下二十九篇了。伏生抱残守缺，就以这二十九篇《尚书》在齐、鲁之间授徒。天长日久桃李芬芳，“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

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待到汉文帝求典求贤大搞文化建设,伏生已九十余岁,路也走不动,话也说不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高高兴兴赶到京城去做博士了。有一个名叫晁错的人,这时还不像后来那样名声大震,只在朝中负责祭祀并兼管文教事务的奉常手下做掌故(官名)。文帝命他赶到济南,向这位老者当面求学取经。没想到伏老博士雅言不良,颍川人晁错又听不大懂伏生女儿为爹爹转述出来的山东话,彼此勉强强,一问一答。一年半载过后,晁错估摸着已学个八九不离十,也就不受这份洋罪——回去了。

原来秦、周以往,政、学为一。学在官府,史册典籍也密藏在官府。因为天文、地理、祭祀、军旅、治政、音律、历法、刑名、经济、文教、服饰、官制——经邦济世之术里边什么都有,所以周朝的统治者一直把《尚书》作为培养士大夫的教科书。不言而喻,这样的教科书自然是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所以后世就把周朝的文字叫做古文。至汉文帝时,伏生在齐、鲁间传授《尚书》已逾四十八年。秦行小篆,汉为隶字。为了教学和传播的方便,伏生就把他手里的《尚书》由古文或小篆转换成了汉代通行的隶字。由于这个原因,后来汉、魏的学者便把伏生所传授的二十九篇《尚书》,叫做“今文尚书”。晁错往济南,得伏生心口真传,伏氏《今文尚书》旋即立于学官,由他的高足和再传高足讲授,代代绵延,盛行两汉。其二十九篇残本,一直放在皇家的中秘书库里留底,四百八十年后,泯灭于西晋永嘉之乱。

三、“古文尚书”的发现

孔子论政,先富后教。夫子的主张,首先普照到了奋发图强

的高皇帝一家身上。刘邦虽然成了大气候，可是说到底，他还是个精明质朴的大老粗。刘家人既然搬进了崭新的宫阙，自然要请几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来给满身征尘的儿孙们上上课。脱贫扫盲，大干快上，曲曲折折不到三十年，“希望工程”大见成效，孔子的话果然在汉家陵阙应验了：为帝为王的刘姓苗裔一片“《诗》云”、“子曰”，霸道王道，阴阳为用，《大风》歌罢，夙夜捉刀，你我来我往亮出文章比短长。

话说在位五十二年的汉武帝有两个与《尚书》相关的亲弟弟。一个是河间献王刘德，另一个是鲁恭王刘餘。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也是也。”），因为酷爱古典，也就特别关注散落在民间的古代文献。刘德求仁得仁，果然在他的王国征集到不少先秦旧籍，满足了他的好古癖。其所得宝藏，在《周官》、《礼》、《礼记》、《孟子》、《老子》以外，使我们最为关心的，就是那些从秦火里幸存下来的《尚书》残篇了。残篇究竟是多少篇？立于学官了没有？是不是在民间有所传授？所有这些诘问，全无下文！

鲁恭王也有点出奇。他既不擅长政治，也不喜欢读书，天性里只有做工程、弄房产的冲动。其唯一的爱好就是修宫室，造房子。到底是因为看上了人家孔宅的风水了呢？还是心血来潮，要表现一番敬贤的好意？——统统说不准。反正王爷要把孔子当年授徒的厅堂打倒翻修，扩建扩建。没想到这事蹊跷，坏旧房，拆老屋，干活的人膀子还没有甩开，钟磬琴瑟之声总在耳边萦绕。鲁恭王心里打醋，只好停工检查。不料在拆坏的墙壁里发现了不少古简。其中的一部就是用周朝的文字写成的《尚书》。恭王将这些意外的发现交给了孔家的后人孔安国。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一世孙，博学多才，既精通《诗经》、古文，又是武帝

时的《今文尚书》博士，就连史官世家出身的司马迁早年学《尚书》，还要向他“问故”。孔安国将他新得的文物与伏生所传的二十九篇《尚书》一一比照，发现不仅文字不同，而且还比伏生的本子多出了十六篇，总共是四十五篇。为了有所区别，后来的儒生就把这部出于孔壁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

不论是孔安国本人，还是以他为渊藪的《尚书》古文学，都不如为伏生所肇始的《尚书》今文学来得干净利索。除了在王莽做皇帝前后有过短暂的辉煌之外，《尚书》古文学在整个西汉都无法与今文学比肩。待到汉光武拨乱反正，下令一切工作都要回到老祖宗的旧辙，反攻倒算之下，一度做了帮手，大有附逆之嫌的古文学派，日子就更不好过。立为学官的《古文尚书》博士一个个翻身落马，没有办法了，只好到民间去大展身手。如此以来，今文家在朝堂继续当道，古文家在学界刻苦钻研，反倒以其真才实学，赢得了思想界的声誉。井水、河水先是并行不悖，互不答腔。天长日久，便要对话、比较、融通。你中有我，壁垒松动；我中有你，门户渐开。及待一身而兼二学之长者出，两大系统交织，慢慢形成综合，遂使东汉后期学术的发展步入繁荣之境。

纵览今、古文《尚书》，一个经过了文字表达式的现代转换，另一个大约还是母本的老样子，即使考虑到因某些语言处理的微妙变化而使经文的意义出现了一些差别，那也只是字体与版本的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源头永远是同一个。犯不上为这点小异而大兴门户，分庭抗礼，以至势不两立。欲使上世帝王的遗书能在当下致用，艰涩的古文必先今文化；而今文通行既久，其肤浅烦琐的流弊，亦必以博雅的古文为药石。这就是今、古文之连环可解，疙瘩可开的客观必然性。到了东汉末

年,《尚书》之学虽在贾逵、马融、郑玄三派古文家那里汇为渊海,但绝不可将其视为仅仅是《古文尚书》一系的最后胜利。方是时,今文学的主旨与精粹,已经融入到以《古文尚书》为代表的最后成果里。

四、“六经”得失与《尚书》大意

有人问孔子:你怎么什么都懂?玩什么都行?孔子被人问得腻味了,也就实话实说:因为我不做官,所以不像做官的人那样今天出国考察,明天回家视察;上午陪上峰胡扯,下午给下级训话,灯红酒绿之下,到了夜里还没有功夫也缺少兴趣坐下来读书喝茶。几十年来,我把精力全用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和学问上了,所以,除了生、老、病、死、怪、力、乱、神之外,其他的我都知道一点。这在你们看来,也就是多才多艺了。

孔子晚年赞《易》,删《诗》、《书》,定《礼》、《乐》,论《春秋》,拿这六部经典兴学教人。日子长了,发现毛病,于是对“六经”育人之得失,便有一番从“正”到“反”,再到“合”的审视与明察。他说:

——《诗》教使人辞气温柔,性情敦厚。

——《书》教使人通达政事,可以远知往代帝王所以治天下的故事和道理。

——《乐》教使人胸怀宽广,平易和善。

——《易》教使人心思洁净,头脑精微。

——《礼》教使人谦恭俭朴,庄重严肃。

——《春秋》教人连缀文辞,记录史事。

但是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生出种种流弊:

——《诗》教之弊是不知通变，使人迂腐。

——《书》教之弊是不知阙疑，以至于出言议事骄诬失实。

——《乐》教之弊是难于从奢华之中及时返归平淡。

——《易》教之弊是偏离常识，祸害正理。

——《礼》教之弊是陷入烦琐，失去生活本身的随和与自然。

——《春秋》之弊是妄加批评，肆意褒贬，有意无意里遂有犯上之嫌。

既然这正、反两面都看到了，那就不能不予以折中调和，以便扬长避短。所以孔子得出结论说：

一个学《诗》的人啊，他应当温柔、敦厚却又不迂腐；

一个学《书》的人啊，他疏通、知远却能谨防骄诬；

一个学《乐》的人啊，他广博、驯良但绝不溺于奢华；

一个学《易》的人啊，他的头脑洁净、思维精微，但不会因为思想高飞到云里雾里，以至陷入玄隐而伤害常识正理；

一个学《礼》的人啊，他恭俭、庄敬却不会流于烦琐；

一个学《春秋》的人啊，他属辞现实，比事历史，撰文记事应当立论平正。

——一个学六艺的人如果真能达到这些要求了，那就说明他把这六部经典的精神实质吃透了。（参见《礼记·经解》）

除了对“六经”作出这样宏观的审视与明察之外，孔子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对每部经典都有随口作出的具体解说和议论。《书大传》记载孔子对他的得意门生颜渊讲述读《书》旨趣：“《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谟》（即皋陶谟）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即《吕刑》）可以观诚。”百篇《尚书》之中，孔子于此特别点出了十六篇，可谓取精用宏，以示格外推崇。可是孔子的点睛之笔毕竟还

不是对《尚书》全豹的勾画。

——是因为记忆力不好呢？还是怕现成的书记文字、天官、史官以及成群结队的贞卜祭祀人员派不上用场呢？反正中国人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喜欢做笔记——这情景和现在动不动就要给头头们照相、录像、拍电影，大事小事都要留档，惟恐小民不晓得，生怕天下后世“秋后算帐”的时候会把他们的丰功伟绩统统漏掉一样，“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最迟在殷商之时就形成了全球首屈一指的史官制度。于是君王们威风了，不朽了，但是也不自由了：“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变成职业记者，记者变成了历史学家和经典作家：“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

可见《尚书》以记言为能事，事皆在言中，话语构成了这部经典的主体内容。今本《尚书·序》以“典”、“谟”、“训”、“诰”、“誓”、“命”为名目，对这部上古、中古官方文件的汇编作出了六个方面的大致区分。除《禹贡》一篇是地理专著之外，这部经典的绝大部分内容，差不多都可以用这六类文体来涵盖：

（1）典。《说文》云：“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然而《尚书》独载尧以来，“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尚书·尧典》记帝尧制历法，举人才，举舜；舜行摄政、命禹治水；以及尧舜禅让等等重要言论和大事。

（2）谟。和“典”一样，《尚书》之“谟”，也是只有一篇。此篇《皋陶谟》记皋陶、大禹在帝舜之前畅谈治国安民之道。

（3）诰。即商、周最高统治者对所封之王、大臣和民众的告谕、劝诫、教导、指示等等。《商书》中的《盘庚》，《周书》中的“五

诰”即属此类。(《周书》五“诰”,或为后世之奏议,如《召诰》;或为后世之诏令,如《大诰》、《康诰》、《酒诰》;或奏议与诏令兼而有之,如《洛诰》)。《尚书》中的这一类文献多为历史档案,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4) 训。真书《高宗彤日》,晚书《伊训》(真书、晚书,详见下文《尚书辨伪》),记录的都是臣下对君王的劝教之辞。所言内容不外乎以史为鉴,清心寡欲,念先王创业之艰难,想亡国之君的可悲,尔为君为王,身系天命,治国牧民必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惟有心中常存忧患,方能长治久安云云。

(5) 誓。《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秦誓》,或为君王,或是诸侯,其率军征伐,就在即将交战之前夕,对将士和盟军所发表的誓师之辞。今天看来,这些东西虽在当年轰轰烈烈,其实并没有多大意思。

(6) 命。多为君王任命官员的人事命令,或对大臣、诸侯有所赏赐时的说辞与清单。如《毕命》《冏命》《文侯之命》《君陈》《君牙》等篇。

五、《尚书》与“历史意识”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进化论尚未尘埃落定,历史主义便不胫而走,如日当空。傲慢的西方绅士就凭这两下子便将前来取经的中国秀才说得目瞪口呆。仿佛是起死回生、包治千疮百孔的灵丹妙药,不管是舶来的还是转手的,这两路外来的